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亲历者言】	北大文革的三大特点	扬子浪
【研究评论】	改革时期的四种文革叙事与历史真相	秦 晖
【史海钩沉】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两次急转弯（下）	刘建业
【更正启事】		陈楚三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亲历者言】

北大文革的三大特点

· 扬子浪 ·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历史发展中，长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北京大学发生的事情对全北京全国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就是因此选择了北大来点燃文革的烈火，掀起了“打到一切”“全面内战”的狂飙。

北大的文革和全国各地的文革一样都是在毛泽东的乌托邦幻想和揪出“党内的赫鲁晓夫”的考量下进行的，进行的手段是直接利用和强化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来动员群众，因此具有普遍性。但北大在文革中又有其显著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由于毛泽东及其“中央”对北大的直接领导。他们在处理北大的具体事务上，并没有长期的通盘的政策考量，只以震动全国为目的，直接操控北大文革以“运动群众”、“指导全国”。北大文革运动由此产生的特点，在文革前两年，表现特别明显。以下笔者分三段来论述这些特点。在每一段，笔者用一句话作粗略的概括，虽然不一定准确，但力求生动形象，有利于读者的思考和回味。

◇ 第一个特点，“社教老左派文革打头阵”。

毛泽东直接批示在全国广播聂元梓七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珏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并多次给予大字报照顾事实和逻辑的，现在看来有点匪夷所思的极高评语：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巴黎公社宣言”等等。北大社教左派如聂元梓、孙蓬一、孔繁、杨克明等等，一批北大中高层干部，不但没有像其他大中学校的干部一样在文革开始时被统统打倒，并且都戴上了“左派”、“造反派”的炫目光环。这些中高层干部在北大文革中从一开始就发挥了重要的有时是主控的作用，这在全国其他单位是非常少见的。被最高领袖加冕的北大干部造反派，还被要求在上海和北京文革中发挥作用，为全国文革推波助澜。

但选择北大社教左派充当文革的第一冲锋队，也不可避免地会留下后遗症。这一点，当年北大最早的反聂组织“红联军”的头头，哲学系四年级学生赵丰田的大字报“拨开迷雾万千重，试看庐山真面目”分析的相当到位。大字报全文太长，不适合在这里引用。笔者概括其要点如下：

社教左派在文化革命的新时期不一定也是左派。由于中央在七人大字报和工作组问题上过早表态，北大真正的文革左派没有时机真正形成，导致“社教左派”高票当选校文革的选举。“事实证明，他们大部分是属于年纪较大，政治比较保守的一支老左派，他们不适合做北大文化革命的主要掌权者。”（注1），他们“阻止群众肃清工作组错误路线”。因此结论是“以聂元梓为代表的前文革筹委会和现在的文革委员会执行的是一条错误路线”，而这条路线的特点是改良主义。

其实错误路线还是正确路线，是没有客观标准的，更不是赵丰田一个哲学系学生能说了算的，而是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根据文革形势择机而定。但正如赵丰田所预言的，北大社教左派这些“老革命”在文革初期就遇到了“新问题”，并且很快就发生了分裂。这个老左派群体是在“社教运动”中反对当时的北大校长，党委书记陆平时形成的。现在陆平被中央迅雷打倒，面对文革新局面，变化无常的领导层，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聂元梓可能由于是七人大字报的第一作者，也可能是江青与她惺惺相惜，继续得到中央的关爱和重用。而孔繁，杨克明可能是得到了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赏识，则随着王任重的倒台成了北大文革错误路线的代表。而赵丰田所在的“红联军”则因为反对聂元梓的“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砸了不久前刚由毛泽东亲笔题词的北大校刊“新北大”。毛泽东的贴身联络员其女儿李讷视察现场后十分震怒，定性说“这是反革命事件”，让校文革立即上报中央文革。赵丰田领军的“红联军”最终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全军覆灭。

但聂元梓在思想上的确仅仅是个“社教左派”，她和她的左派同事们，对后来毛泽东自己概括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没有准备的，也不像蒯大富，韩爱晶这些青年学生这么容易被中央文革调教，因此在后来的运动中多次被江青批评太“温”。由这些“社教左派”为核心的北大校文革，政治上相对成熟稳健，在文革的一些节点上，如“反二月逆流”、“揪军内一小撮”等，态度比较暧昧和保留，与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原教旨”少壮派王力、关锋和他们在中央部委机关的势力如学部的吴传启等产生了摩擦，也受到了校内外态度激进的主要是原“三司”的学生造反派的攻击。

“三司”的全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包括50多所高校的60多个红卫兵组织，其核心是“地院东方红”。北京大学早期的反聂组织，自炫为北大真正革命造反派的“井冈山”也是三司的成员。“三司”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选择和培育的文革第二冲锋队，在批评刘邓路线，冲击中央各机关部委上，作风泼辣，是“造反派红卫兵”的代表。在血气方刚的打打杀杀的第二冲锋队眼中，老气横秋的北大聂元梓们自然是不入流的，是“吃老本”的。特别在聂元梓被中央空降，担任北京红代会的主任后，这些文革新锐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这种不满和蔑视必然会在具体事件的分歧上爆发出来，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的“民族宫”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现在只要再仔细读读地院东方红对聂元梓在事件发生后签署的“首都红代会命令”发表的声明，就能感觉到有一种蔑视溢于纸背。在孙蓬一四月十二日讲话后，四月十六日，地质学院革委会和东方红公社发表了“关于目前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几点声明”，声明说孙蓬一的讲话“是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宣言书，是北京市反动保守势力向革命造反派猖狂进攻的总动员令。”。

“《新北大公社》根本不是造反派组织，而是北京市反动保守势力之所以有恃无恐的合法庇护所。”，“聂元梓根本没有资格代表红代会进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在孙蓬一四月十二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讲话中，也可看出，北大的老左派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对手想干什么，是想阻止北大老左派的代表聂元梓进入即将成立的北京市革委会的核心。但被毛泽东极度夸张地赞誉过的北大干部造反派，很自然地在自我定位上出现了偏差和膨胀，把这种对自己的攻击认定为对文化革命正确路线的攻击，是企图摘取和独吞革命的果实，以对“新北大”的态度划分真、假革命派，并大张旗鼓全线反击，成为北京两大派长期缠斗的一个重要原因。

◇ 第二个特点，“北大校文革变成稀有物种”。

由中央文革操控的北京大学关于工作组的大辩论开全国驱赶工作组的先河，但留下的问题是文革由谁来领导。8月1日，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聂元梓、杨克明、列席会议。张恩慈作为工作人员（张也是北大社教的老左派）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了他们三人，康生、曹轶欧参加了接见。毛泽东指示，北大应该成立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的组织，要聂元梓负责成立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工作，以后用巴黎公社选举的方法产生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公布。9月9日北京大学建立了全国为数不多的根据《十六条》中规定的“巴黎公社的全面的选举制”选出的文化革命委员会。

北大校文革是根据《十六条》仿照巴黎公社模式经北大师员工民民主选举产生的，既是全国第一个，也是不多的几个文化革命委员会。《十六条》公布一方面在党的决议层面肯定了文化革命的合法性，但却没能同时把全国的文化革命运动纳入十六条设计的轨道。大串联的狂潮席卷全国，各地省市在红卫兵造反派的冲击下，摇摇欲坠。毛泽东朝令夕改，很快用“夺权”代替“选举”，发出了“一月革命”和“革命委员会好”的新指示，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新的“三结合”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所谓的“三结合”是军队代表、干部代表、群众代表三结合。这种变化就先天性地把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置于一个比较窘困的境地。

北大校文革的反对者经常攻击校文革是陶铸王任重路线的产物，聂元梓也对“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后来变得另类的名号感到不适，多次向周恩来、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询问，是否要重新成立“革委会”。北大校文革在文革新阶段变成了稀有物种，颇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味道。但因为是由毛泽东发话，在中央文革直接领导下产生的，又不宜废除改组，处境十分尴尬。进入一九六八年后，北大校文革，经北京市革委会多次肯定和其他北京高校革委会一样的政权机构。因此校文革自然不同意北大“井冈山”和它直接谈大联合，而要领导“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实现大联合。而北大“井冈山”则认为北大校文革是陶铸王任重错误路线留下的产物，“由反革命两面派王任重一手炮制的‘样板田’”，拒绝承认它是全校的合法政权。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记得“念念不忘一个‘权’字”这个口号，各路革命造反派全部以夺权、保权为最高任务。“新北大公社”的口号和纲领是“捍卫红色政权！”，“井冈山兵团”的口号和纲领是“二次革命！”“全面夺权！”。北大两派在政权这一核心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是北大两派，不能联合，最后兵刃相见的重要原因。

◇ 第三个特点，“北大革命师生最先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陈伯达在六七年六月五日对聂元梓、孙蓬一作十分严厉的批评。他完全忘掉了当年来北大主持辩论大会时，一口一声“革命师生”，又是“致敬”，又是“万岁”的表演。这时的说辞是：“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你们现在是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想夺无产阶级的权”（注2）。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对闻名全国的造反派作如此公开严厉的批评，反映了文革当局对北京市二派斗争越演越烈，长期不能控制的焦虑。

这个批评的直接政治效果是如陈伯达所愿“北大大乱”，“炮轰聂元梓”、“打倒孙蓬一”的口号响彻全校。聂、孙在校内忙于检查，在校外则延迟了对吴传启们的进攻。

但陈伯达在讲话中提醒聂、孙，你们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还是在北大激起了思考的涟漪。新北大公社“六六串联会”是当时陈伯达讲话后，北大几天之内冒出来的各种组织中最大的一个，对聂、孙取“一批二保”的政策。但他们对聂、孙的批判，对青年学生革命造反中产生的各种错误倾向的反思是真诚的。这种思考在“六六串联会”的骨干化学系的陈双基起草的以“六六串联会起风雷”战斗队之名贴出的大字报《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大字报得到了最好的反映。王复兴在他的文革回忆录《抢救记忆》第五章第十一节，对这张大字报有详细的摘录和分析（注3）。该大字报认为：在红卫兵运动中“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愈闹愈多，愈闹愈大”。“青年学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经起过先锋和桥梁作用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当革命运动深入发展后，必须和工农结合，否则就会犯错误，动摇无产阶级政权。”“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广大的工农兵。”

以这张大字报为代表的思潮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预见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期会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来收尾。其实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这些帽子一直是毛泽东在党内控制和驾驭知识份子的不二法器，在文革初期为了鼓动青年学生造反，他只是暂时搁置不用。

在一年多以后，文革乱局仍然得不到控制，毛泽东借着清华“七二七”事件，向所有的大中院校派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再次把“革命师生”“造反小将”打回了“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原形。工军宣队进校后，紧接着开启了全国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文革时期的在校大学生老五届也被分配到全国基层工矿农场务工务农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陈伯达的这个6·5讲话可以看作是这个文革大结局的先兆。毛泽东本人则是格局更大的谋略家，他还要等等，等到事情更向反面转化，等到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团派抵抗他这个“黑手”派遣的工宣队枪响时，才卸磨杀驴，才正式拿造反派和青年学生充当“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替罪羔羊。

北大文革的这三大特点既由于北大的特殊地位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关注和直接干预，也源于他在发起和推动文革时的极其草率的主观任意性。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北大师生发动的。和一九五七年北大的反右运动，一九六四年北大的社教运动一样，都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央”强加给北京大学的。在文革中祸害北大至深至巨的，不是那个在文革初期被他捧上云端的“坏女人”，更不是当时分裂成对立两派的北大广大普通师生，而是这个诬称北大为“反动堡垒”、“池深王八多”的前北大图书馆馆员。

注释：

（1）“拨开迷雾万千重，试看庐山真面目”，哲学系四年级一班赵丰田大字报，1966年10月16日。

（2）电子杂志《记忆》第143期，“陈伯达1967年6月5日的讲话”。

（3）《抢救记忆》王复兴著，美国南方出版社，2016年。

□ 原载：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美国南方出版社，2019年3月

~~~~~

# 【研究评论】

## 改革时期的四种文革叙事与历史真相

• 秦 晖 •

这几十年来，我们实际上形成了四种文革的叙事模式。这四种模式，我们可以放在一个二维坐标系中，用纵横两个坐标来划分：一个就是对我们的这个体制持维护的立场，还是持否定的立场？就是反体制的，还是维护体制的？这是人们讨论文革的一个维度；另外一个就是对文革本身，认为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就是肯定文革的，还是否定文革的？这又是另一个维度。文革这事有意思的就是，肯定体制的人也有骂文革的，也有赞成文革的；反对体制的人，同样也有赞扬文革的，也有骂文革的。因此用我刚才讲的两个坐标，就可以把我们现在关于文革的认识归纳成四种叙事：

### ◇ 毛左叙事：体制型的肯定

第一种叙事是体制型的肯定，就是从维护体制的角度来肯定文革。现在基本上就是所谓“毛左”的立场。但最早这其实是起源于国外的，像旅居加拿大的华人李宪源就是早期网络初兴时很活跃的一位。更早还有西方学术界思想界一些文革期间就比较活跃的极左派。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们曾经一度很失落。当时揭露了文革的大量黑暗面，而他们毕竟是洋人，对中国发生的这些灾难他们是无以回应的，因此他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是中国改革20多年后，改革时期的弊病，比如工人下岗等等出现后，他们的话语权又开始恢复了。所以在中国改革时期，肯定文革的所谓毛派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从海外传来的。他们肯定文革是毛主席继续革命的伟大创举，是为了人民群众而铲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证红色江山不被修正主义改变颜色。这些话听起来很意识形态，实际上讲得通俗点，就是说文革是毛主席为了老百姓而反官僚。老百姓不满意官僚，毛主席也不满意，于是毛主席就支持老百姓造反，可惜失败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对邓小平的改革持否定态度，有人称为“反邓思毛”，一些人直接就骂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我在哈佛时，哈佛大学对面有极左派“美国革命共产党”办的“革命书店”，这个党的领导人阿瓦基安文革时就在中国留过学。那个书店里的书总的调子就是说中国在1949—1977年是社会主义时代，1977年以后就资本主义复辟了，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又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断送了。这种观点90年代前就在海外有，在国内基本上是没有的。但现在在国内也越来越盛，尤其在一些对现实不满，又对过去不了解的青年人中间。

这就形成了第一种文革叙事。

### ◇ 邓（陈）式“否定”叙事

第二种人同样是要维护这个体制，但他们对文革非常反感，这是一种体制型的否定。这样的否定其实表现程度也有区别。最典型的是陈云式的否定。大致地讲，在邓小平、江泽民时代，这种观点是主流观点，官方观点。它把文革当做一场几乎断送了共产党事业的一种鲁莽灭裂的举动来反对，尤其对当权派在文革期间受到的冲击耿耿于怀。简单讲，这种否定文革主要是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来否定。官僚们在文革期间吃了苦头，因此他们否定文革，其实主要就是否定所谓造反派，认为老百姓竟敢批斗当官的，那就是最大的灾难。这种观点对文革前十七年充满好感，认为如果不是文革的话，沿着十七年这个路一直走下来就很好了。他们主要是在肯定十七年的基础上否定文革。

当然这里也有区别。他们中很多人包括邓小平，从否定文革也反思到了十七年，平心而论这是很不容易的。一开始否定文革的时候，其实不打算否定十七年，但是人最可贵的一种品质就是将心比心。你抱怨挨整了，你就要想到你当初是怎么整别人的？有些人自己挨整了叫屈，但是整别人他一点都不含糊。自己被整死了，他也只知道为自己叫冤，从来不反思他当初怎么迫害别人。而赵紫阳、胡耀邦包括邓小平可贵的就是从文革时自己被整，也想到了文革前历次运动怎么整人的，包括给右派“改正”，给彭德怀平反，这都是通过反思文革，深化到反思十七年。

但那时主流的观点，还是说十七年是对的，而文革是错的，错就错在它破坏了十七年的体制。这种观点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它回避了十七年的社会矛盾，把文革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毛个人的浪漫。说毛主席过于理想主义，想入非非，有一种诗人气质，老是想要搞最好的东西。他本来功劳盖世，只是晚年发生病态的多疑，对他的战友产生误解，而当时很多坏人——从林彪、“四人帮”直到社会上的所谓造反派据说是利用了毛泽东的多疑，结果就造成这么一场大乱。他们基本上是围绕当权派在文革中的受难来进行反思的。在他们眼里文革中最大的受难者就是当权派，而最坏的人就是造反派。简而言之，我前面讲的毛左，认为文革就是毛主席支持老百姓整官僚，这些人其实也是这样说，也认为文革就是老百姓整官僚，只是评价相反，前一种人认为整对了，而他们认为是大错。老百姓整官僚还了得？那是犯上作乱！两者在事实判断上差不多，但在价值判断上是截然相反的，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这些年最大的两种声音就是这两种：要么是毛派的声音，要么是所谓“邓派”的声音。毛派说文革好就好在老百姓反对官僚，邓派说文革坏就坏在老百姓反官僚。那么好了，由于这两种声音特别响亮，因此很多人就把“文革就是老百姓反官僚”当成了不容置疑的一个事实。尽管这个事实有人说好，有人说坏，但都认为文革就是这么回事。

文革中当然有这样的事，但文革只有这样的事吗？文革主要就是这么回事吗？文革没有相反的事吗？相反的事很少，乃至不值一提吗？这就是关键的问题了。

#### ◇ “造反”不等于“造反派”

其实在中国80年代这种观点就曾经导致了一场争论。改革初年要算文革的账，当时叫“清理三种人”，清理文革中犯下罪过的那些人，上至“四人帮”，下至下面的很多所谓造反派。可是一追究下来就发现，文革期间，尤其是文革初期带头做坏事的，其实不是所谓的造反派，往往是所谓老红卫兵。这些人主要是高干子弟，“根正苗红”，他们带头“造反”，但主要并不是对当权派造反，而是对社会底层造反，简而言之就是整所谓的“黑五类”、“狗崽子”、“牛鬼蛇神”，还有“破四旧”。这完全是矛头向下的暴力。而这个矛头向下的暴力当时是非常血腥的，满街抄家，随意打杀，死了很多的人。北京的“红八月”，卞仲耘惨案，郊区大兴县的灭绝四类分子，都是这个时期的事。而当文革发展到整当

权派的那个阶段，就是1966年10月以后，实际上就是整到他们爹妈头上了，于是这些人就成了当时所谓的“保爹保妈派”，或者叫“保皇派”，于是他们就站在了造反派的对立面。改革开放以后清查，就有人强烈要求清查他们。

但这事到了陈云那里就被制止了。1984年当年一个老红卫兵给中央写信，说现在有人想借清算造反派把火引到我们这些红二代的身上。陈云就专门批示，说“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该是第三梯队选拔的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什么叫做“将水搅浑”？就是说本来清算文革只能清算老百姓做的坏事，八旗子弟做的坏事是不能清算的，他们是我们的人。当时陈云还有一句讲得更透，大意说我们的后代再怎么样，也不会挖我们的祖坟，我们是要传给后代的，因此他们是不能动的。那么能动的是什么呢？就是老百姓。当时所讲的造反派，指的就是老百姓和官僚产生冲突的那些人。从1984年就把所谓“老保”从清理“三种人”中排除，文革中很多恶性案件从此不了了之。包括几年前又重新被提起的北师大女附中打死校长卞仲耘的案件。

实际上当时打死校长的人是谁？不是后来的造反派。那时在学校掌权的正是那些红色衙内们。这里要指出，文革初衙内们对学校领导的冲击和后来百姓们对党政部门的冲击很不一样。文革期间最早的红卫兵运动是在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发生的，像北京的101中学、清华附中、师大女附中、北京四中等。这些学校也是中国当时办得最好的学校，国家领导人当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最好的教育，因此他们都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

可是最好的学校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它有好的学习氛围，如果学校里都是一帮八旗子弟整天提着鸟笼到处遛鸟，怎么可能成为好学校？所以好学校一般都要重视好学生，要强调学习。麻烦的是学习好的学生不见得都是衙内，很多学习好的学生出身又不高贵。可以想见这些学校的领导很难做人：你不重视学习好的学生，不鼓励学习竞争，学校的水平就会下降，上面会怪罪说我们把子女交给你们，你们这学校就这水平？可是如果你要重视学习，那你势必会推崇那些分数好的学生。这些学生如果恰好是衙内，自然皆大欢喜；假如不是，假如他们甚至出身卑贱，衙内就要怒了：我们才是接班人，你却抬举他们？“阶级路线”反动！你就死定了。

所以这些学校的领导其实不是领导，而是衙内的保姆。朝廷把衙内交给保姆去照顾，保姆照顾得不好，衙内就发火了。文革初期这些最好的学校闹得特别厉害，包括我们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儒，当时也被打得一塌糊涂，没被打死就是了，卞仲耘就是这样被打死的。但是这些事情后来就不查了，为什么？因为衙内和他们爹妈不让查。

他们当年虽然最早高喊“造反”，但那时还没有“造反派”和“老保”这一对后来曾经脍炙人口的概念——这对概念形成时，他们通常已被归入“老保”了。平心而论他们也确实不是造反派。衙内打保姆可能也是调皮捣蛋，但那能叫造反？高衙内整林教头如果是造反，那林冲上梁山难道算是保皇？

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要求下后来的清查就只查造反派。而造反派兴起的时候，衙内们确实沉寂了几年。这种沉寂后来就被算作反对文革。“否定文革”的话语权改革初年主要在他们爹妈手里，现在已经逐渐转移到他们自己手里。这种“否定”的一个特征，就是非常突出文革中老百姓整当官的，把这个图景几乎描绘成文革的唯一图景。文革中最突出的受害者就是当权派，最突出的坏人就是所谓的造反派。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老百姓应该是乖乖的，不能挑战当权派，不能让危及上层既得利益的事再次发生。

这样“反思文革”得出的教训，就是要进一步强化社会控制，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民主因素。文革的混乱被说成是民主的罪过。他们经常讲中国是不能搞民主的，你看一搞民主，老百姓就会乱来。文革被他们看作“民主”，并用作反对中国民主化的最重要论据。而且否定文革就是要向这方向用力，比如说取消“四大”。

文革中标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好像曾经有过言论自由，当然只是“好像”而已。毛泽东如果想让大家整当权派，曾经有段时间是可以贴当权派的大字报的。实际上只是贴毛泽东希望打倒的那些人的大字报，当时谁敢贴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但是80年代否定文革的时候，就说让老百姓随便贴大字报是不行的，于是就把这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给取消了。同时又把中国以前《宪法》中规定的很多公民的权利（尽管从来没有当真），包括游行、示威、罢工等等权利都给否定了，这都是在否定文革的口号下进行的。

到90年代又出现一个变化，就是这些人从文革时老百姓对当权派的冲击，联想到1989年中国发生的事，他们就非常自觉地提出一个“清醒”认识。以前的意识形态说，我们是代表人民的，我们要为人民服务。当时这些人就明确地说，我们是执政者，执政者就要有自己固有的利益，应该清楚地知道执政者的利益和老百姓是不一样的，要有一种“执政者的自觉”。执政者就是要让老百姓听话，让老百姓服从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服从老百姓。

这就是当时传说的“太子党纲领”。像这样一种充满既得利益色彩的主张也是打着反文革的旗号，而这种主张现在是越来越成为有利于肯定文革的人的“背书”了。因为人们看到否定文革的人带有那么浓的既得利益色彩，他们当然就会产生逆反效应。你既然要反对既得利益，似乎好像你就要肯定文革。也正因为这样的“否定文革”而强化了“毛左”对文革的肯定，似乎文革真的就是一场“民众狂欢日，权贵受难时”，从而具有了平等主义的玫瑰色彩。

◇ 官方从“否定”到回避，社会上出现两种“非主流”的声音

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尴尬：肯定文革是不行的——如果肯定，那老百姓又要起来反官僚怎么得了？而“否定”也越来越不好说了。现在老百姓听了这种基于权贵立场的“否定”，也会导致他们不喜欢的联想。肯定不行，否定也不行，于是就越来越趋于回避。

他们回避，但问题仍然存在，这就出现了另外两种声音。

一种声音就是所谓反体制的人对文革的肯定。这种观点其实也是在90年代在海外开始兴起的，主要出现在国外一些由当年的造反派，演变为现代民主派的人士中。最有名的是华人经济学界曾被认为最可能得到诺贝尔奖、但不幸英年早逝的学者杨小凯。杨小凯在文革期间的名字叫杨曦光，当时是湖南造反派最激进的一个笔杆子，写过一篇《中国向何处去》，因此坐了多年的牢。他当年是造反派，后来成了民主派。他就认为，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是中国特色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也是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先驱。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肯定文革的，尤其是肯定文革中的造反派运动。与此类似的还有刘国凯，他当年是广东造反派骨干，广东旗派的活动家，后来也到了海外，也成为民主派。他也是力图把文革期间造反派的那些活动和现在的民主派挂起钩来。他提出一个观念，叫做“两种文革论”。他认为现在讲的文革掩盖了两种不同的内容：一种他叫做“毛泽东式的文革”，就是毛泽东弄权术清除他的政敌，像刘少奇这些人，他认为这种文革是不好的；但是他说文革的主流是另外一种，他称之为“人民文革”，他认为文革是因为人民对文革前十七年的官僚体制本身就积累了很多不满，平时没有办法，毛泽东这个时候开了这么一个口子，于是这些人就借题发挥，就闹起来了。



杨小凯和刘国凯的意思都是说，当时老百姓造反，其实主要不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是他们对现实官僚体制真实的不满。这种真实的不满在他们看来是应该肯定的，因此他们对文革中的造反派应该说是持一种全面的肯定态度。这种全面肯定不仅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把造反派视为被压迫者的反抗而给予同情，而且也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认为当年造反派的主张就是自由民主意识在当时的先驱。

这些人尤其是杨小凯，的确在文革期间写过一些文章。这些文章与他后来的思想有没有连续性？可能有，但我觉得关键还是后来他坐了牢，在狱中接触到一些有水平的“牛鬼蛇神”，受到了启发，这是他自己也回忆到的。如果他没坐牢，仅凭他原来写的那些东西能发展出他后来的思想吗？或者，如果他不仅没坐牢，而且还得势了，那些文字就不可能发展出与民主相反的一些可怕思想吗？

当然你也可以说，凭他写的那些文字他就只可能坐牢而不可能得势。写异端文章坐牢，牢里继续接受启蒙，启蒙结果成为民主派，这个因果链成立不成立呢？这就用得着那句话了：“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人文的因果是概率性的，因果链一长总概率就很小了。且不说那些文章是否必然导致坐牢而绝不可能得势（我们知道毛那时经常抬举一些离经叛道的文字用作打人的棍子，当然这不妨碍他用过就扔，出尔反尔），就算很可能坐牢，那时“文字狱”极盛（这对所谓“四大”的“言论自由”不啻反讽），形形色色的文字（比如一些“灾异论”文字，一些“封建迷信”甚至乡愚自称真龙天子的文字）都可能导致坐牢，但不等于这些文字都是民主思想的萌芽。

所以我觉得从当年造反派变成今天民主派的人的确有，甚至还不少，但是这种心路的关键还是他们的受害经历以及与受害相关的后来阅读经历（后者可能更重要，很多造反派受害后没有这种阅读经历，就更可能变成今天的“毛左”而不是民主派）。如果因此就说他文革期间写的东西是一种自由民主思想的萌芽，这能说得通吗？大家不妨去看看杨小凯当年写的《中国向何处去》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我想现在的读者大概都不会认为这篇文章是在鼓吹自由民主的。但是他们作为个人的确有这样的思想脉络，他们如今对现存体制是持否定态度的，同时他们肯定文革（至少肯定造反派），这就是所谓的反体制肯定派。

#### ◇ 改革派的文革叙事：文革之恶首先是体制之恶

还有另一批人，就是反体制否定派。这里要讲清楚，所谓反体制，不一定就意味着要采取什么激进的反党派姿态。我讲的反体制，就是认为这个体制是需要改变的。当然他们通常主张渐进的、和平的、有序的变化，但总是认为现在的体制有根本性的毛病。我把这定义为反体制。这些人对文革持强烈的否定态度，这就是第四种看法，叫做反体制否定。

这种观点80年代曾经流行，而且当时似乎有成为主流的可能。它在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派老干部中尤其流行。《炎黄春秋》上的文字对文革主要就是这样一种判断。这些文字实际上对毛和十七年体制是否定的，在这点上跟前面讲的刘国凯、杨小凯有类似的地方。当然这两人很激进，因为他们在海外，国内改革派一般都不会那么激进。

而在发生学上，它与80年代维护体制的文革否定论者中的一些人也有联系。我前面提到，80年代否定文革，是在维护体制的前提下否定文革的，包括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其实最初都是这样。但是随着认识的深化，他们中很多人，包括小平在1989年以前，多少都把对文革的反思延伸到了对文革前十七年的反思。不仅纠正了文革之误，而且纠

正了文革前十七年的很多错误，包括反右、大跃进等。这些对文革前十七年的反思，实际与这里讲的这第四种主张是有联系的，或者说第四种主张是他们更进一步的深化。

这种观点在文革的原因分析上，强调文革与此前十七年政治运动传统的连续性。这就与陈云式的文革否定论大有区别。换言之，陈云他们也认为文革坏，坏就坏在文革是断裂，它破坏了十七年的好东西。可是民主改革派就认为文革的坏和十七年的坏是连续的，文革的坏是十七年的坏的一种极端的发展。他们并不认为这两者是矛盾的。他们偏重于强调文革与此前十七年政治运动传统的连续性。

而其实在连续性这个事实判断上，他们和李宪源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毛左派倒是有点相似：毛左派也是肯定这两者的连续性，认为文革是为了捍卫十七年的好的东西，十七年是好的，文革更是好的。而“第四种叙事”则认为文革是坏的，是十七年坏的极端化。但是在价值判断上，这种叙事对这一连续性恰恰是持严厉的否定态度的。毛左要维护乃至强化体制，而他们要批判体制；毛左称赞文革，而他们否定文革。所以在前述的两个坐标上他们都与前面讲的体制性肯定派观点最对立最不可调和。

◇ 社会史意义上令人同情的思想，就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现代思想吗？

而他们对“反体制肯定文革”论者的歧见首先也在于一个事实判断，即“造反派”的造反到底是原教旨主义的“奉旨造反”，还是另有诉求、反抗压迫的“借旨造反”。

怎么看待刘国凯和杨小凯的人民文革论？文革期间的造反，与十七年间积累的社会矛盾有没有关系呢？恐怕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对这个关系的重要性有很不同的估计。有些人如徐友渔先生说有这种因素，但不是很重要，大部分情况下造反还是受到毛泽东的煽动；有些人说这种因素非常重要，甚至是造反派造反的最主要动因。

我则认为，社会史问题与思想史问题应该分别考察。它们有联系，但并不是一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文革时期的造反多大程度上是真的感受到官僚体制的压抑而借毛给予的机会起来抗争，多大程度上只是盲从毛泽东的一种意识形态冲动或者“响应号召”的行为？或者用现在通俗的说法，是真有“反骨”的人“借旨造反”，还是完全愚忠者“奉旨造反”？

对这个问题我认为，造反派一度赢得广泛社会同情，掀起那么大声势，而且在毛泽东卸磨杀驴镇压造反时在许多地方遇到很大阻力，这表明“借旨造反”确实是那时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仅用“奉旨造反”是不足以解释那时的造反风潮的。但社会上对“造反派”的同情与“造反派”本身，尤其主流造反派领袖的想法并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在当时情况下，能够得势的造反派头头，甚至并未得势却仍存得势希望的头头，还是以“奉旨造反”为圭臬，与社会上的同情者保持距离，划清界限，乃至为避嫌和“纯洁造反派队伍”而参与镇压“借旨造反”者。上海造反派热衷于镇压“经济主义（底层劳工的维权斗争）”就是典型的例子。即使是“广西四二二”那样从未得势、而且最后受到残酷镇压的造反派，对“借旨造反”的底层抗争者（如由返城知青组成，力图加入四二二但始终未能如愿的“青年近卫军”等）仍是避嫌和排斥的。只是在临近覆灭时，部分“四二二”才与之联手进行了死里求生的困兽之斗。主流“四二二”如果得势，他们对“青年近卫军”从回避发展到镇压，像上海“造反派”镇压“经济主义”那样，并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造反”确实有相当程度的“借旨”成分，不看到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当时的“造反”。但文革官方承认（包括暂时承认）的“造反派”组织主要

还是“奉旨”行动的。尤其1968年后，仍留在“革委会”中的少数当了官的“造反起家”人士与文革前当权派和军方仍有矛盾，但群众性造反已不存在。那种为个人境遇和权力分配进行的博弈就更是“奉旨”行为，即便为个人境遇而“借旨”，也已经没什么社会学意义了。

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当时即便是“借旨造反”的反官僚，哪怕你真的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你因此反官僚是一种值得同情的想法，但是这和你这思想是不是一种现代性的自由民主思想还是不一样的。古代历朝的百姓造反，可能都有官逼民反的因素，但不能说宋江、晁盖这些人就是民主派吧？他们的造反值得同情，和他们是不是民主派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值得同情的人不见得都是追求自由民主。

民众造反动机有争议，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争议更大。他到底是基于权力斗争需要，还是意识形态的浪漫动机？毛泽东真那么理想主义，他认为现实的体制就是有很多缺陷，想通过鼓励造反来建立一个排除官僚主义的体制吗？似乎多数论者都承认这一点，最常见的论证，就是说毛当时威望很大，要清理政敌完全可以用斯大林式手段，用不着冒险发动民众冲击自己建立的党政机器。可见他还是乌托邦，太浪漫了。

我不反对说毛泽东有浪漫想法，但以上论证方式我以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首先，把文革中的群众运动与斯大林式警察手段分离乃至对立起来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文革中有群众运动，但难道没有斯大林式的警察手段？“彭罗陆杨”、“杨余傅”、“王关戚”直到“林彪集团”哪个是通过“群众”，通过“造反派”搞掉的？彭德怀王光美算是群众组织弄出来斗的，但彭德怀和刘少奇、贺龙等等一大批最著名的大“走资派”一样，还是死在警察控制中，而非死在“群众”批斗场上。王光美更是在“揪出”她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自己被抓8年后才走出黑牢，这8年她也是受“群众运动”所害吗？

再者，这样的论证与其说是通过“行为”推测动机——这本身就不可靠，不如说是先定“动机”再剪裁行为。如果发动民众整官员就证明他动机是为人民，那么毛难道没有依靠官僚整过民众？“反右”不就是吗？刘少奇“镇压群众”不就是以为毛泽东要“反右”吗？这为何就不能证明毛泽东的动机是为官僚？至于毛泽东何以一度鼓励群众性造反，也完全可以给出“形而下”的解释，根本不必动辄归之于“乌托邦”。

但这表明文革认识中有个相当严重的误区，即把“民众整官僚”当成文革的主要图景，甚至有人有意无意说成是唯一图景。整了官僚的民众即所谓造反派似乎只是整人者，他们被整似乎只是在文革后或毛死后、邓时期。前面说过，关于文革最大的两种声音，即“毛左”式的肯定和邓式（严格地说陈云更典型）的“否定”在这个事实认定上是一致的，只是价值判断相反：前者说毛泽东支持民众整官僚是对的，邓小平报复造反派是错的，后者说毛泽东鼓动民众整官僚是错的，而邓整肃造反派是对的。

无怪乎文革结束40年后，大量没经过那个年月也被禁止了解真相的中青年会对文革产生浪漫的想象：在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因民主法治缺位造成严重积弊、官僚腐败和官民矛盾更甚于文革前的情况下，他们不仅容易对“毛泽东鼓动民众整官僚”滋生向往，还会因“邓式否定”对“毛泽东鼓动民众整官僚”的指责而对邓不满，并觉得这种“否定”反而背书了文革的可爱。

但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认定”真的是事实吗？

## ◇ “造反派”、“老保”与被遮蔽的文革真相

上面讲的这四种观点，实际上都反映了一个问题，即文革期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大家知道甚至在很多地方发展成流血成河的内战。像我的家乡广西，仅仅在1968年7月到8月两个月间发生的那一场大镇压，就导致了将近10万人的死亡，说是流血成河一点都不假。为什么会闹成这样？就是因为相信毛主席的号召，大家起来造反，只不过有些观点不同，就至于闹成这个样子吗？

当然这背后是有一些真实的社会矛盾。那么这个矛盾到底是什么？大家知道文革期间有两个名词当时的老百姓都不会听不懂，但是现在的人们就经常听不懂了：一个就是所谓的造反派，另一个是文革期间作为造反派对立面经常提到的，但是现在极少提到的一个词，叫做保皇派，又叫“老保”。文革期间很多冲突在老保和造反派之间发生，即便后来被认为是“造反派内讧”的冲突，其实也还是有“继续造反”和“恢复秩序”、“拥军”和“反军”的分别，即激进造反和适可而止的区别。现在关于文革的叙事，对造反派的描写很多，他们被形容为几乎是青面獠牙的一群怪兽，做尽了坏事。

但是保皇派呢？保皇派现在不太提到。如果提到，往往就说（首先是他们自己说，当局也往往认可这种说法）这些是反对文革的人。其实保皇派怎么是反对文革的人呢？保皇派其实是最早参加文革的。刚才讲的“老红卫兵”，那帮把校长打死的衙内（当然动手的往往不是衙内们自己，而是衙内的巴结者），他们是最早投入文革的。但是他们后来的确跟造反派产生了矛盾，于是现在说他们是反对文革的，其实他们只是反对造反派而已。他们并没有反对文革，甚至不反对“造反”——“造反有理”的口号最早就是他们喊出来的。只是与造反派“矛头向上”（尽管不是“最上”）的造反不同，他们的“造反”是矛头向下，是权贵打贱民，衙内打保姆。他们卷入文革、乃至卷入上述的“造反”比造反派还要早得多，而且暴力得多。现在在国外研究文革的真正严格的学者中，对这两者是分得很清楚的。文革期间是有很多老百姓起来反官僚，同时又有官僚体制支持的一大批对立面去镇压他们，这些人就被叫做保皇派。

保皇派和造反派是不同的。那么这两种人，到底哪一种罪过更大一些呢？这里我要讲，其实文革参与者没有什么人完全清白，造反派当然也做了很多坏事。但是到底谁做的坏事更多？哪种人在文革中应该负更大的责任？这是有争议的。前面讲过，按陈云的看法，基本上保皇派是没有错的，包括他们打死人都是不能追究的，因为他们打死的都是地富反坏，都是狗崽子。只要不是打死我们这些当权派就好，打死老百姓那是无所谓的。打死校长，校长好像不是老百姓，但校长不过是衙内的保姆，校长在衙内们看来也不是什么地位高的人。只不过是我们让他们来照顾我们的子弟，结果我们子弟一发脾气把他打死了，打死了就打死。衙内打死保姆不也是常有的事吗？那也是不能追究的。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1992年以后，陈云的经济主张基本上失势了——在80年代的改革中，邓小平和陈云代表两个不同的方向。邓小平主张走市场经济道路，陈云虽然也批评毛、批评“凡是派”，但他其实主张苏联式计划经济，批评毛只是反对毛用“大轰大嗡”搞乱了计划。1989年后到1992年，中国曾有一度举棋不定，甚至出现一些骇人听闻的说法，什么要把个体户整得倾家荡产。但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就把这个事情又扳过来了，南巡就提出来要搞市场经济。1992年以后，陈云的经济观点基本上就失去了市场。但恰恰在这个时候，他的政治观点，尤其是关于文革的看法，即使在陈云去世以后也没有衰落，反而在高干子弟，就是所谓当年的保皇派贵族红卫兵大量从政的背景下发展得更加突出。

这样一来，文革十年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就被遮蔽了。文革中最残忍的一页到底是什么？现在可以肯定地讲，造反派整走资派是有很多不人道的、残忍的甚至是罪恶的现象，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文革中最残酷的一页不是什么造反派斗走资派，而是文革中对文革前“贱民”群体、包括对造反派的残酷镇压和屠杀。

我们可以看看几幅照片。这是什么场景呢？这几幅照片反映的是国共内战吗？是建国初期的剿匪吗？是二战时期的轰炸吗？都不是。即便按照邓小平时代否定文革中揭露的造反派迫害走资派的模式，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场景。造反派的确对走资派很不人道、很野蛮，戴高帽、批斗会等等，这些迫害的镜头人们看到很多了，也确实应该公布这些镜头。但是更骇人听闻的是当权派对造反派的大屠杀，何止是迫害而已。

在我的家乡1968年7月到8月间，广西当权派与军方武装保皇派，并动用官方民兵和正规军围剿造反派。当时广西的这几个大城市，像我的家乡南宁，在这场战争之后的场景是什么样子？我曾对学生说，当时没有相机，没有人拍下来，但是你只要看看二战时期的斯大林格勒，当时的南宁就是这个样子。当时的南宁造反派控制区在镇压中几乎整个就被轰平了，仅仅这一场镇压就死了将近10万人。那时城里到处都是死人，以至于从火车站到市中心广场的朝阳路，在路边就地起坟。就成百成百地在那里埋人。还把大量的人推进邕江，尸体顺江而下，漂出珠江口，使港澳人都大吃一惊。

广西发生的这些事其实在80年代、90年代也有所披露，但人们当时只是讲了这事的残酷，而没有讲这个残酷的来龙去脉。那时的广西是谁在杀谁？于是一些记载，尤其是国外一些书还说广西的这一幕是造反派屠杀别人。实际恰恰相反，在广西出现的是镇压造反派时的大屠杀。广西屠杀造反派很厉害的一个原因，是文革前的第一把手韦国清一直就没有失势。他能够利用旧有权力资源动员起各种各样的力量来镇压造反派，所以在广西就杀人杀得特别多。

而且大家知道毛泽东对广西的屠杀是支持的。1968年7月3号，毛泽东亲自批示了《七三布告》，《七三布告》就发起了广西出动军队来镇压造反派的那样一个行动。在《七三布告》公布的前后两个月内，按照后来“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公布的“不完全统计”，有名有姓有死亡记录有最后抚恤的就有近8万5千人。广西有20多个县不仅大肆杀人，而且发生骇人听闻的吃人的现象。而调查指出，这些人中只有4千人是死在两派内战的战火之中的，其他人都是在非对抗状态下被杀的俘虏和平民。换言之就是真正在武斗战场上被打死的人并不多，大部分是屠杀俘虏，屠杀平民。更可怕的是大部分的死亡，90%以上的死亡不是在群众性“造反”的无政府状态下，而是在成立了革委会以后，在有秩序的条件下，由当时的当政者从上而下有领导地进行的。

尤其是广西有20多个县发生吃人的事，把人杀了以后又肢解，把肝啊肉啊拿来炒了吃，像这样的事情真是匪夷所思。这种事被揭露后曾有一种说法，为什么会发生这事呢？据说因为广西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少数民族本来就有野蛮的吃人习俗。这应该说完全是胡说。广西这个地方少数民族聚集的主要是西部，东部是汉族聚集区，中部是少数民族和汉族混居的地区。“处遗”资料表明：少数民族比重最大的西部，也是广西最穷最落后的百色和河池这两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些事，大量的吃人事件都是在汉族居住区和高度汉化的少数民族汉族混居区发生的。因此把这种事归咎于少数民族野蛮习惯是毫无道理的。

◇ 文革叙事中被遮蔽的最重要事实

因此可以说，如果乱民整官僚、“造反派整走资派”在某一个时段，比如说从全国而言1966年10月到1967年8月这一个时期可能是中国政治迫害的主流，那么在整个文革十年，从1966到1976这10年里就不能这么说了。十年里官僚整老百姓，包括当权派整造反派，远比民众整当权派来得残酷。前面提到，过去官方的否定文革和如今毛左的肯定文革，都把毛泽东支持百姓反官僚当做文革的主要图景，这种说法是非常片面的。百姓才是文革悲剧真正的主角，而这个百姓中就包含了造反派。他们在得势的时候的确野蛮，我并不想掩盖这种野蛮。但他们更是百倍野蛮镇压的受害者。

文革当局鼓动群众暴力和“群众专政”的确是当时的特点，有人还说这是与斯大林秘密警察专政的不同之处。但是斯大林式警察专政在文革时期（尤其是“十年”文革）绝非不存在。而死于群众暴力的主要也是贱民与反对派群众（当时官僚“挑动群众斗群众”要比群众斗官僚血腥得多），而非“走资派”。

在短暂的造反派得势期间，很多“走资派”确实吃过群众暴力的苦头。但除了衙内得势时被打死的“保姆”（贵为校长的“保姆”在衙内面前其实算不得“当权派”）外，当权派遭受的群众暴力主要还是戴高帽、游斗中的推推搡搡之类，像煤炭部长张霖之在批斗中被打死（这是个文革当局直接介入的非自发事件）这种恶性案例其实是极少的。千年来“百姓怕官”的遗威并未在“造反”中消除，“奉旨造反”“借旨造反”的“刁民”对落难“大人”施暴通常还是有点分寸的。但是“革命群众”打死“四类分子”、“老保”民兵（文革时期维持运作的民兵，尤其最野蛮的农村民兵基本是保皇派把持）、非武斗状态下屠杀“造反”者的事是成千上万地发生，而且伴随着酷刑、轮奸，满门抄斩，活剐被吃等惨绝人寰的兽行。“造反派迫害走资派”哪里有过这种场景？

很多“走资派”在文革期间长期受难，直到改革初期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时才被解放的不在少数。但其实他们“受造反派迫害”的时间很短暂，绝大多数场合他们受的其实还是“体制内常规迫害”。当然，造反派应该说也是奉旨造反，这个账其实也应该算在下旨者头上。但即使奉旨造反也不是主要的，他们的受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实与“造反派”根本无关。如“彭陆罗杨”早在1966年5月就被捕，罗瑞卿甚至在1966年6月就跳楼自杀未死。但那时有造反派吗？王光美应该说是被造反派迫害的典型，大家都知道蒯大富批斗了她。但蒯大富自己1970年就被捕了，王光美却一直被关押到1978年底，在长达8年多时间里她这个“走资派”其实是与蒯大富这个“造反派”同时坐牢。这时迫害她的就是毛当局，而不是什么造反派。这样的受难与文革前的清洗、斯大林式的迫害没什么不同。而所谓毛泽东有不同于斯大林的独特的“反官僚”情结的神话，也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以上四种文革叙事中只有第四种是比较接近事实的。但即使这种叙事，以往仍存在着很多缺环。而官僚整百姓，当权派整“造反派”在这些叙事中大都被有意无意忽视。纠正这种忽视，实事求是地还原这一时期领袖的翻云覆雨，以及翻云覆雨之下百姓整官僚的野蛮和官僚整百姓的更加野蛮，是非常必要的。

（作者简介：秦晖，男，生于1953年。1966—69年一直当初中“新生”，1969—78年上山下乡在“早稻田大学”，1978年成为文革后首届研究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现退休。）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

【史海钩沉】

##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两次急转弯（下）

• 刘建业 •

（上接 z k 1 9 0 5 c）

第五小点：毛究竟感受到了什么？

毛泽东能够如此快速的做出反应，说明周恩来的反击仅仅是一个契机，毛自身应该也有与周相似的感受。“720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但其表现出来的民心、军心却不能忽视。他看到了军队对文革的疑惧、集体怠工和反抗，看到了对原四方面军将领的怀疑与攻击——军队原本是要为毛“倒刘”保驾护航的，绝不能因军队山头之争的暗伤导致分裂。他应该也感受到了外交危机，假如真的需要因香港问题与英国开战，军队还能打仗吗？像许世友躲到大别山，找都找不着。

此外，我本人1967年10月份还听到过“联省自治”的传言。我哥哥当时在华南工学院上学，同学中广东人和华侨居多。他们听香港的广播，说许世友、韩先楚等人要搞“联省自治”。这些广播如果被毛知晓，肯定会影响他的判断和决策。

综合这些现象，我想，正在驾驭着文革这艘大船的毛泽东，一定是感受到了大船倾覆的危险，不得不“急转弯”。让王关戚做为替罪羊，以换取军队的忠诚。王力后来喊冤：说他的“8·7讲话”基本上都是毛泽东的原话、原意，这应该是事实。王力被抓以后，毛规定不准任何人提审王力，正源于此。问题在于毛泽东本人的立场变了，一是要有个说法，二是要找替罪羊，为前一段的混乱负责，就不得不对王关戚“挥泪斩马谡”了。有人回忆，把王力、关锋关押后，看到江青哭了。有人评论：江青痛失车马炮，应该也是事实。

清华大学“414”的理论家也很敏感，他们提出：文革的航船转向了，毛泽东掌舵绕过了暗礁。他们准确地看到了毛这次急转弯的原因——如果不绕一下，很可能就要触礁了。

毛泽东1967年9月下旬回到北京，王海容急忙前往打探。毛念了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就把她打发走了。王与外交部的刘华秋弄清楚诗句典故后，理解为王、关完蛋了。其实是毛自身心境的写照——不是他想抓王关戚，而是形势逼迫不得不抓，即使是像他这样自负甚高的“英雄”，也有“运去不自由”的时候。

◇ 接下来是讲座的第二部分——“批林批孔”从突发到戛然而止

1974年初突然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不仅普通百姓感到突然，连中共二把手周恩来都感到意外。不久，大家都看出了苗头，原来“批林批孔”是“批周公”啊！然而诡异的是，也就在运动热火朝天的进行之时，却又戛然而止，让人大惑不解。今天，我也冒昧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我们首先还是先说背景。

“913事件”之后，毛泽东虽然是庆幸躲过了林立果的刺杀，但也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向百姓解释他和林彪的关系。不是老说“英明”吗？为什么没能看出林彪是个野心

家、阴谋家呢？如果说你早就看出了林彪是坏人，可你又为什么把他立为接班人，还破天荒写进党章？

为此，毛不得不拿出文革之初写给江青的一封信，想向大家表明，早在文革初期，毛就看出了林彪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个人相信原先确有这么一封信，不过发表时根据需要做了大量的改动。除此之外，毛还公布了对他本人杀伤力极大的“571工程纪要”。

当时李德生、纪登奎都反对公布，把他们的意见反映给周恩来，周说：主席可能另有考虑。在随后的一次接见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领导人时，周当着众人问毛：这个要不要发？毛当即回答：必须下发。“571工程纪要”公布以后的效果大家想必都很清楚了。

也就在毛泽东绞尽脑汁，致力于撇清与林彪关系之时，周恩来却借尼克松访华，在外交上大放异彩。基辛格创造了一段话：“既然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此不持异议”，解决了当时中美联合公报最大的难题。但我们大都不知道周恩来也创造了一个词，解决了很多西方大国与中国建交的障碍。

以前西方大国为什么不能与中国建交？主要障碍是要求他们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原则。后来周恩来创造了一个词儿——“注意到”，只要对方“注意到”中方这个立场即可。

这种方式最早出现在与加拿大建交公报里。中方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加方“注意到中方的这一立场”。“公报”没有坚持要加方一定承认、而只是“注意到”中方的立场。这个先例一开，澳大利亚、日本等等很多西方大国都争先恐后与中国建交，国际上对此评价很高：称之“周恩来外交”。

毛自己是灰头土脸，周却在内政外交上连连得分，大有功高盖主之势。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913事件”之后，周恩来主导批判林彪的“极左”。而实际上，毛、林和文革极左是一个共同体，批林极左不可能不涉及到文革中的极左思潮、极左做法，这些东西可不是林彪的专利，甚至可以说林不是这个专利的主要所有人。

对此，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封杀了周批判极左思潮的主张，钦定林彪是“极右”。可林彪原本是文革“左家店”的二掌柜，却硬要去批他的“极右实质”，实在是有些生拉硬扯。尽管靠着毛的权威，硬是把批左压了下去，但毛也深知，在政治上难以让人心服。而且周的主张在党内外大有市场，很可能会成为今后对文革秋后算账的旗帜。如果不及早根除这股势力，非但文革迟早会被断送，毛本人最后也难逃脱被清算的命运。

毛当年发动文革，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害怕有人在他身后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清算他大跃进饿死数千万百姓的罪行。现在，刘少奇虽然已经从肉体上彻底消灭，再也不会死灰复燃了；但保卫文革的“成果”又成了新问题。他别无选择，只有发动一场保卫文革“成果”的圣战。而这一次，毛心目中“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非周莫属。

## （二）毛周关系简单回顾

毛周关系决不像官方史学所描绘的那么亲密，从毛泽东终其一生，从未踏入过西花厅一步，即见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我们都知道，周曾经是毛的上级，而且两次将毛从领导岗位



上拿下来，尤其是后一次，宁都会议，撤掉了毛的红军总政委，由周取而代之，让毛去做苏维埃主席。虽然并不完全是周主导的，但毛毕生耿耿于怀，不肯原谅。

被共产国际确认为中共领袖不久，毛便开始了“延安整风”，整肃张国焘、王明、张闻天等，接下来还要整肃周恩来，被前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制止（共产国际当时已宣布解散）。毛写了9篇文章，赞扬刘少奇，讽刺挖苦周恩来，还没来得及发出来就“胎死腹中”，这也让毛很郁闷。

1958年的南宁会议，毛对周就毫不客气。指责他：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反冒进”不是马克思主义，“反‘反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毛拿着上海的元旦社论问周：恩来，你是总理，你写得出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他几乎是指名道姓地批评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米！毛有意用柯庆施取代周恩来。

高压下，周提出自己是否适合再担任总理的问题，毛没有挽留，只是让中央书记处研究。结果，中央书记处集体意见仍要周担任总理。整个1958年，周在各种会议上检讨自己“右倾保守”达13次之多。

我本人在1968年曾看到过一个原汁原味、没有修改润色的毛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提到：周恩来这次表现不错，没有跳出来。

文革酝酿阶段，周也是毛要整肃的目标。据林彪《工作笔记》，1964年12月毛的生日宴会，毛曾借着酒劲对林说：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都排斥姓毛的，把我逼急了就闹个天翻地覆。林彪当时也认为，刘、邓、周都是毛要打倒的对象。周能够从被打倒的对象，到后来跻身于“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且与毛缠斗一生，还最终能够得以善终，可以说是奇迹。当然，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这里不展开说了。

特别让毛愤愤不平的是，周恩来却总是能够博得党内外的好感乃至国际上的盛誉。他也曾几次动过整周的念头，但都被周的太极软功所化解，到头来总是不了了之。随着渐入垂暮之年，毛深感安排后事之急切。而要根绝他生前身后否定文革的隐患，解决貌似恭顺、实则心怀异见的周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 （三）毛悄然开始了“倒周”的布局

毛要“倒周”，不仅有个人恩怨，更为重要的是要保卫的“文革成果”，尤其是身后不会被颠覆。为此，他悄然启动了几个步骤：

#### 1，邓小平复出

毛泽东驾驭群臣的策略，均是让其相互制约。“八大”之后，分别由刘（62年后）邓主管党务、林彪（59年后）主管军队；周恩来主管政府，其实还有康生、谢富治主管的秘密情报系统。相互制约、互不越界，最后都要到毛那里去汇总，毛始终是仲裁者。

文革后，刘邓被废黜，林彪辅以江青仍然制约周恩来。但，“913”之后，周的威望不降反升，而江青一干人份量太轻。左思右想，当时的中国政坛上只有邓小平有足够的资历、威望和能力能够挟制或者进而取代周恩来。再加上邓原本属于毛派，在历次党内斗争中都是站在毛一边。1958年曾按照毛的意思“叠床架屋”，以中央书记处挟制国务院。只不过1959年之后开始刻意与毛拉开距离，对毛敬而远之，却和刘少奇配合默契，令毛很

是气恼。在文革的狂热中，邓小平被定为“第二号走资派”，但毛始终对他网开一面，处处将其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重新启用邓小平是一部险棋，但也是一步高棋。毛对邓的重新启用分成两步：首先将其从流放地江西接出来，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在随后的考核中，令毛十分满意，一句话就升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掺进”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和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同时制衡周、叶二人。

## 2，把王洪文提拔为“准接班人”

“9 1 3”之后，毛泽东内心深处最理想的权力架构应该是江青任党主席（或者是选一个傀儡，由江青掌舵），张春桥任总理。但江青志大才疏，经常依仗特殊身份撒泼耍赖，积怨甚深。再说，江青成也身份、败也身份，身份固然可以令其颐指气使，别人不便计较；但身份也注定她不便名正言顺的就任中共主席。而张春桥则因1970年的庐山会议几成公敌，让他担任总理，阻力太大。

不得已，只有退而求其次，毛看中了曾任上海“工总司”头头的王洪文。既是造反派头子，能与文革荣辱与共。王又是张春桥一手扶植起来的，对张言听计从，也意味着对江青言听计从。既可以做江、张的傀儡，有没有江、张面前那么大的阻力。

主意已定，毛借汉高祖刘邦“非刘姓为王，天下共击之”的典故，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能推出一个姓“工”的？“十大”之前，特意将其从上海召到北京考察；“十大”上推荐其做中央副主席，位列毛周之后第三。毛泽东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昭告全国，将来我的接班人是王洪文，而不是很多人认为顺理成章的周恩来。

## 3，政治局开会批周

这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却极少见诸媒体。官方史学往往闪烁其词，所以有必要多说几句。

1973年11月13日，周恩来和来访的基辛格结束了最后一次会谈，14日凌晨基辛格就要飞返美国。晚宴后，基辛格突然提出，临时再加一次会谈。请示毛来不及，拒绝了也不礼貌，周就与基辛格临时增加了一次会谈。

会谈中基辛格提出了中美军事合作，美国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按说这是一件多好的事儿啊！看看日本、看看韩国，省下大笔军费开支，把钱用于国计民生。但，周恩来不敢当家，需要请示中央，实际就是请示毛，承诺基辛格登机前答复。这次会谈中方由唐闻生做翻译。

然而，当周想向毛请示时，却被告知毛睡觉了。周知道，睡觉对毛是一件大事，经常会因被打搅而发火。再加上毛刚刚经历了一次休克，身体还没能完全恢复，周也不便贸然去把毛叫醒。一时间急得团团转，直到基辛格要走了，周才不得不答复，但话说得很活：双方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应该说，并没有超出他的权限。

毛泽东似乎正在等待着周恩来迈出这一步。基辛格14日凌晨走，当晚毛便召集唐闻生、王海容核对周与基辛格会谈的记录。反应如此之快，不能不让人怀疑是事先设下的圈套。随后，王、唐二位“小姐”又秉承毛意，不动声色找周进行了核实。接下来，王、唐开

始四处放风，说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

11月17日，毛泽东亲自出马，为蓄意已久的批周敲响了开场锣鼓。他严厉批评这次中美会谈“并不怎么样”，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根据毛的决定，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主要是批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

后来自称是毛一条狗的江青，一马当先向周开炮。一会儿说周“左”了，“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执行好联美整苏的方针；一会儿又逼周交待，与美国人的会谈中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后来江青上纲越来越高，指责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逼迫他承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周恩来忍无可忍，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看周恩来不服气，毛泽东随即下令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并亲自拟定了列席会议的人员名单，除了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外，又专门钦点邓小平出席。地点也由钓鱼台改到人民大会堂，由王洪文主持，王海容、唐闻生担任联络员，每天向毛汇报会议情况。

11月25日至12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周进行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开场由唐闻生原原本本传达毛泽东批周的最新指示和近期对外交工作的批评，足足讲了八个钟头，调门非常之高，许多用语与毛对刘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样。如毛泽东宣称：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原本是批周擅自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对付苏联；这会儿又变成了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真是不知其中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会上对周无限上纲、围攻批斗的场面，特别是江青指着周的鼻子大骂的阵势，让一些刚刚进入政治局的工农代表如陈永贵、吴桂贤等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如今几乎所有人都对周尽力回避，即使正面相遇也表现冷淡。”

据目前披露出来的资料，江青称“这是第11次路线斗争”（第9次刘少奇；第10次林彪），还把毛1972年初病重时向周交权之事诬周要“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乔冠华、章含之夫妇为解脱自己，对周落井下石；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动辄呵斥，疾言厉色；最后是邓小平为了获得毛的信任，对周讲了几句重话：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邓由此重获毛的信任，很快跻身于核心领导层。

江青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责令周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出检讨，其它任何人都不能插手。周在没有秘书帮助，没有任何其他信息来源的情况下，只有俯首认罪，对会议上各种责难和捕风捉影的诬陷“照单全收”，强迫自己喝下种种难以下咽的污水。为了打消毛的疑心，周在检讨的末尾还明确提出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

在周恩来把各种各样的“屎盆子”、“尿盆子”统统扣在自己头上之后，终于换得了伟大领袖高抬贵手。毛发话会议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作者注）才是迫不及待。”

这次“批周”会议的记录，文革后邓颖超和叶剑英联名打报告，由胡耀邦销毁。因周临终前对邓颖超有过交代。我想，周恩来夫妇担忧可能因为“批周”会议上纲上线太高，且大多不实，而周为了过关，在检讨中“照单全收”。容易引起不知底细的后人的误判。

后来的事情更具戏剧性——毛对周说：总理，你受苦了。并指着王海容、唐闻生说：就是她们两个，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让王、唐二人为其背黑锅。王、唐二人私下说：“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要我们去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

#### 4，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发生在“批周”会议结束后不久，震动了整个中国。为确保无人敢于抗命，毛把闲置多年的“总司令”朱德请出来，故作姿态地称朱德是“红司令”。此外，还加上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共同助威。各种资料对此都描述得很多，也很详细，不再赘述。

奇怪的是，毛泽东当众又说了些貌似无的放矢的话：“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文革发动前夕他曾屡屡这样说过，那时暗指刘少奇，现在说又是针对谁呢？毛还话里有话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上述4点——邓小平复出并重握大权，王洪文成为准接班人，政治局批周会议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是“批林批孔”运动前的中国政治生态，也是毛暗中所进行的“倒周”部署。接下来，“批林批孔”就要开场了。

#### （四）“批林批孔”爆发

1974年1月24日大年初二，江青突然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由迟群、谢静宜宣讲早在1月18日已经备好、24日周恩来尚不知情的中共中央74年1号文件，并对周、叶（剑英）进行不指名的攻击。次日又召开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如法炮制前一天的进程。

我当年就在北京当兵，虽然不知内幕，但深感来者不善。尤其是周恩来在会议上所做的检讨：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不知道”，中央和国务院系统“抓晚了”，“落后了”，更让人不解——难道要开展这么大的一个运动，身为中共二把手的总理都不知道？这太不正常了吧？

与江青召开“动员会”同时，报刊上开始了铺天盖地般的“批林批孔”宣传，充满着火药味。堂堂《人民日报》居然出现“屁话”这类极为粗鲁的语言。《解放军报》被剥夺自己的内容，“照排”《人民日报》长达178天之久。

江青俨然以批林批孔运动的负责人自居，对政治局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她到处以个人名义写信，送材料，指派亲信党羽四处点火发难。各地文革中的造反派——主要是未能从文革造反中获益，或最初曾经获益、后又被拿下去的人物——闻风而动，重新拉起山头，纷纷起来揪斗当地“翻案复辟”的代表人物。这些造反派虽然人数不多，能量不小，闹得生产下降，人心惶惶，大有第二次文革爆发之势。

“郑州思想沙龙”创办人邵晟东老师曾经谈过他个人的一段经历。“批林批孔”开始时，也曾有人动员他：这次运动矛头是对着周的，如周下台，得跟着下一大批，会空出许多位置，是个好机会，怂恿他积极参与。已经看透了这次运动的邵断然拒绝了那人的说项。

这个期间，江青等人又挑起了一系列“事件”，件件都是射向周恩来的暗箭。

如“黑画展览”，鉴于文革极左——即使是对外交往的窗口也都是“红色海洋”，全是毛像啊语录牌啊，不适于尼克松访华后逐步活跃的对外交往。周恩来要求创作一批供国内各大宾馆装饰的中国画，还可以将部分用于出口。结果被江青批为“美术界的复辟逆流”的典型，还举办了“黑画展览”。

“蜗牛事件”则是四机部派人去美国考察、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时，接受了美方赠送的一个小礼品——玻璃蜗牛。江青等人认定是美方讥讽中国电子工业“爬行”，接受了礼品就意味着“丧权辱国”。后经调查，就是人家的一个风俗习惯。但江青这么一骂，不得不照顾她的面子，取消了与美方签订的合同。让中国人晚了好些年才看上彩电。

电视片《中国》是意大利著名左派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因为介绍中国比较客观，有一些“落后面”。江青在政治局观看影片时边看边骂：这是与帝国主义开办的合股公司，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外交路线上出了大问题，出了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坏人自然都进来了。

周恩来接受杨振宁、李政道等人建议，指示物理学家周培源写了一篇关于基础研究的文章，被张春桥等人诬为复辟，直称要掀其后台，不管是谁，不管多高的职务，虽然他们明知是周。

此外还有批判“无标题音乐”、晋剧《三上桃峰》以及湘剧《园丁之歌》。说起《园丁之歌》也有点故事：

江青对其持否定态度，理由是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是共产党，怎么是教师、知识分子呢？剧中还有一句唱词：“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江认为这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污蔑中伤，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逼着湖南省委批判这个戏。

这帮湖南人也挺坏的。等毛泽东来湖南休息时，他们让毛看。毛一看，不错啊，还鼓了掌。借着毛的权威压江青。到了1976年2月，江青“擅自召开12省市打招呼会议”，还不忘大骂湖南省的有关人员。

这段时间内，还爆出了河南的“马振扶事件”，北京“小学生日记”以及张铁生“白卷事件”等等。

除了有意寻衅，制造出这一系列事件外，江青还指挥她的一班人马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舆论宣传工具，连篇累牍地刊载所谓“评法批儒”的文章。以“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与上海的“罗思鼎”最为有名。他们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大搞影射，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蓄意将矛头指向周氏。

因为不便在党报上做得太露骨，上海专门创办《学习与批判》杂志，由张春桥、姚文元一手操控，在文字上更加赤裸裸。例如“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甚至有“端着胳膊”这样直白影射周恩来的文字，生怕老百姓不知其所指为

何人。江青在天津小靳庄为一周姓妇女改名字“周克周”，同时露骨的说：“要用你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老百姓都看明白了，“批林批孔”就是“批周公”。

#### （五）“临门一脚”，突然生变

1974年7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先后赴武昌、长沙等地，用《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的话说，他要“离开京城这块喧嚣之地”“一个人静下心来认真考虑一下”“倒周”的成败得失，衡量一下风险与收益。这也是毛在政治上作出重大决定前的习惯。

至此，毛已经做好了“倒周”的一切准备：组织人事方面有王洪文、邓小平取代；批周会议后周恩来的问题已经半公开化；八大军区司令对调造成军队混乱，不可能“干政”；舆论上更是铺天盖地的宣传，此时只需把“孔老二”、“投降派”等任一标签与周恩来划等号，周就要步刘少奇的后尘了。

然而，仿佛是天降奇迹，毛泽东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毛不仅骤然中断了已经箭在弦上的“倒周”之举，还把“四届人大”的主导权直接交给了周恩来。这有点像一场足球赛，好不容易把球带到对方球门附近，马上就要射门了，却突然中止了！不管是国内关心时政的百姓还是国外的“中国问题专家”，真是一头雾水。

#### （六）毛泽东突然察觉到了危险

在45年后的今天，在获得了大量资料之后，我个人推测，是毛泽东突然察觉到了危险：一个潜在的危机可能正在北京酝酿。尽管毛并没有证据，但他敏感地觉察到了风险。他只能果断采取措施，将“批林批孔”运动刹车，安抚潜在的对手，化解尚在萌芽之中的危机。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毛的这次转变呢？个人认为有两点：

##### 1，周恩来主持的国庆招待会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主持国庆招待会。当面容消瘦的周恩来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上时，人们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不断地呼喊：“周总理！周总理！”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前排的争相上前握手，后排的也都破例站在椅子上，招手、打招呼……周在招待会上所作简短的祝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

我个人当年看过周主持国庆招待会的新闻纪录片：周连续做了五、六次手势，都压不下去那热烈掌声，我当时就感到非常震撼！

国庆招待会强烈的拥周场面，让毛泽东心中很不是滋味。他太明白招待会所透露出来的“拥周”信息了。此时如果还罔顾党心民意，执意“倒周”，极有可能激起强烈的反弹——后来发生“4·5运动”证明了他的预见——他已进入垂暮之年，再也没有胆略去冒如此大的风险了。他不能不暂且把“倒周”搁置起来。

四天以后——1974年10月4日，毛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至于谁任总理，或者说周恩来怎么安排，毛都没有表态。

此时的毛泽东，或许仅仅意识到“倒周”之事还需从长计议。非但没有决定再次由周担任总理，而是恰恰相反。他心目中认为最急迫的还是：抓紧提升邓小平的权柄，加快“以邓代周”的步伐。

## 2，王洪文秘密的长沙告状

如果说，国庆招待会上所出现的强烈拥周场面，令毛非常震撼，不得不中止“倒周”计划；那么，王洪文的秘密长沙告状之举，倒是让毛突然间警醒——一个潜在的危机或许正在形成！

按照官方说法：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在与江青等人密谋一夜后，背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秘密飞到长沙毛泽东处告状。王洪文称当时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恩来“住在医院里，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要他回去后要多找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对这段“官方说法”，长期以来似乎无人深究。然而，事情果真这么简单吗？

个人认为，在这貌似平和的表象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那就是，正是王洪文的长沙告状，让毛泽东突然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王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庐山会议，就是林彪企图将自己的意志，借会议被煽动起来的气势，强加给毛的一场“未遂政变”。好在毛当时就在庐山，可以及时采取对策。然而这一次，他身在外地，鞭长莫及，一旦北京事发，那后果难以想象！

## （七）危机真的存在吗？

或许有人会问：你说的那么玄乎，真有那么严重吗？

这是个好问题。在一个口口声声要“依法治国”，却连自己制定的“档案法”都不遵守，应该开放的档案依旧做为“国家机密”，想获得相关证据是很困难的。但也不是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寻。下面几条可作参考：

1，王洪文“长沙告状”之后，“批林批孔”即戛然而止，与其来势汹汹的开端形成鲜明的对照。“批林批孔”的实质就是要改变“913事件”后的权力格局，但事实是，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如果能称得上改变的话，邓小平权力更大、“四人帮”的权力更小了。这显然与运动发起者的初衷完全不同。

## 2，毛泽东刻意加强了对“嫌疑对象”叶剑英等人的笼络。

例如，毛泽东让王海蓉、唐闻生将他“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的意见带回北京时，特意说：“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

11月6日，李先念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工作时说到，“小平的问题解决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却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

这和一年前政治局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态度已经明显不同。

3，鲜为人知的是，在王洪文、周恩来去了长沙之后，毛还秘密召见江青去长沙。但官方至今对此缄口不言，媒体也鲜见有披露。

毛为什么在召见周、王之后，又特意召江青到长沙？毛和江都谈了些什么？我们至今一无所知。但从江青此后采取了比较合作的态度，不再处处寻衅，我个人推测，毛很可能会告诉她前一段的风险，以及眼下暂退一步、将来再找机会反击的战略。

4，陈永贵回忆，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 and 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

凡此种种，如果不是因为毛意识到了某种潜在的危险而暂退一步，又能用什么理由解释呢？1975年底，毛又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一定意义上说，不就是要把当年“四届人大”上被迫交出的权力再夺回来吗？

去年11月，我赴京采访了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先生，谈及这段历史，他说了一句话：邓小平复出，（公安部长）李震之死，政治局“批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批林批孔”，五件事其实是一件事。什么事？你自己去琢磨。他的意思实际上和我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一件事就是“倒周”，也可以说是改变“913”之后的权力格局。

这五件事中，我唯一没有提的是李震之死。身为公安部长，掌管着“刀把子”的人，竟然死在戒备森严的公安部大院内！说“他杀”，用了顶尖的技侦手段、顶尖的技侦人才，都无法获得任何证据予以支持；说“自杀”，又找不到自杀动机。用周恩来的话说：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他没有任何自杀的动机。

李震之死，有太多谜团难以解释，当年在北京城也是轰动一时。我个人看法，自杀是肯定的，动机则是至今还没能为我们所知因素——假如真像纪先生所言，五件事是一件事的话，李震之死一定与高层的权力斗争有关。那就太敏感、太黑暗，不便在这儿讲了。

至此，毛泽东在文革中两次急转弯已经讲完了。热切希望网友们质疑并提出宝贵意见。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在两个转弯中，第一个主要参考资料：王绍光的《超凡领袖的挫败》和徐海亮《720事件在文革中的位置》；第二个主要参考资料：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

□ 来源：《文史讲堂》微信群

## 【更正启事】

编者按：陈楚三近日来信，指出我们选载他所著《人间重晚晴——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第五章第一、二节中有若干错误（见本通讯第九五三期，选载之一，2018年4月9日），特提出更正如下：

1、第一节第一段第四行，“因为它的指令周期太慢”，我的回忆录原文是“因为它的运算速度太慢”，不知为何将“运算速度”改为“指令周期”？前者普通人基本上都懂，而后者不一定。此外，原文到此为一段终了，另起一行；选载则连续，未另起行。本段第十一行，“随机数据”，原文是“随机资料”。



2、第一节第六段第四行，“高登榜报经中央党史数据征集委员会同意”，原文是“高登榜报经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同意”，选载将“资料”改为“数据”，英文中可以通用，但中文意思不同，而且这是一个中央机构名称，改得不伦不类。这个错误，包括前一条错误，我判断很可能是使用了港台的中文繁简体转换软件造成。

3、第二节倒数第八段第一行，“据说在刘泽彭拿我的信以反面材料打‘小报告’前后，李锐也曾以正面材料向陈云推荐了此信。”此处的错误在于：陈云获取我信的渠道只有刘泽彭，李锐并没有向陈云推荐。这个错误应该由我负责。由于我的疏忽，向贵刊提供的不是最终书稿。我的回忆录最终稿是：“刘泽彭给陈云打‘小报告’，是把我的信作为反面教材；而当时的李锐，据说认为我的信讲清了红卫兵的来龙去脉，让青干局的正副处长传阅，看来是持肯定态度的”。

2019·5·13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